考古中国

走近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

王 芬

焦家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，主体遗存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，距今约5200年至4400年，是黄河下游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。作为与长江流域的“良渚古城”同时期的古城代表，“焦家古城”2024年被写入人教版全国统编七年级上册历史教科书。焦家遗址呈现出怎样的时代风貌？

焦家遗址于198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，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复查和试掘。自2016年起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联合多家单位持续开展系统性考古工作，成果获评“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并入选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”第五阶段核心遗址及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。作为古国时代第二阶段“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，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”的典型代表，焦家遗址为探寻中华礼制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的系统性证据。焦家遗址开展的持续性工作，正是立足黄河下游，回应中华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重要实践。

10年考古，3个阶段清晰可见。

2016年至2022年，考古调查确认古城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，并结合勘探与重点部位解剖，发现一处总面积约12.25万平方米、始建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，代表了黄河下游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。对城址南门址开展发掘，确认城墙分两期营建，采用集束棍夯版筑而成。厘清了古城在大汶口中晚期七八百年间的聚落历时性演变，并清理出一批结构清晰的房址及数量众多、等级分明的墓葬，其中不乏规模较大、拥有多重棺椁、随葬玉器与精致陶器的大型墓葬。确认大汶口文化晚期即出现“三重棺椁”，墓地的总体棺椁使用率超过70%。象征权力的玉钺以及彩陶、白陶等礼仪陶器的集中出现，丰富了学界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形态与礼仪制度的认识。



▲焦家遗址墓葬出土的各类精致陶器。 王 芬供图

2023年至2024年，在之前城址的外围发现第二圈壕沟，面积约49.5万平方米，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。之前城址更名为小城，在小城内确认若干大型夯土建筑基址。

2025年至今，明确小城大型建筑基址的分布和结构；通过对第二圈壕沟的解剖，确认其内侧存在城墙；并在更外围的区域发现第三圈城墙与壕沟的新线索。

至此，通过10年的系统工作，基本明确了焦家古城具有三圈墙壕，小城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，城内的聚落演变、布局结构和社会内涵也基本清晰。中城和外城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，两圈城壕是否同时共存，还需要开展工作进一步探索。

以田野考古为基础，一系列多学科研究纷纷展开。植物考古表明，先民以粟和黍为主食，动物考古则揭示肉食以家猪为主，辅以鹿和淡水鱼类。碳氮同位素分析进一步显示，晚期精英阶层与普通阶层的“食谱”存在差异，折射出社会分化的加剧。体质人类学研究则显示，先民身高体壮，男性平均身高超过1.7米、女性超过1.6米，两性已有明确劳动分工；而对骨骼创伤与劳损的观察表明，高等级人群亦非“不事生产”的特权阶层。锶同位素分析，则在部分墓葬中辨识出“外来人口”。地学考古重建了城墙与壕沟的完整“生命史”，磁化率分析协助确认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。

玉器的科技分析尤为引人关注。无论是随葬玉器墓葬所占比例，还是玉器在随葬品总数中所占的比例，都超过了已经发现的其他大汶口墓地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前认为大汶口不重视玉器的看法。古城内已出现玉器专业化生产，部分蛇纹石来自泰山山脉，部分透闪石可能来自东北，绿松石可能来自鄂西北，反映出距今5000年左右远距离资源流通的网络已然形成。

种种线索交织，使得焦家先民的生活图景鲜活起来——稳定的粮食与肉食来源，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，跨越千里的资源流通网络，兼具实用与礼仪功能的器物生产。而精英阶层亲身参与和引领着这座古城的营建与运转。

焦家遗址的考古，为海岱地区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丰富内容。岗上、垓下、大汶口和王庄等同时期遗址也相继确认城址或发现高等级遗存。这些分布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大型聚落，既在宏观上展现社会分化加剧与礼制萌生的时代共性，又在聚落布局与丧葬习俗上各具特色，提示海岱内部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并非同频共振。如何深入理解这种多元发展轨迹，或将成为未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
若将视野延展至海岱文化区之外，焦家古城的遗存中还可辨识出来自中原仰韶—庙底沟二期文化、长江下游良渚文化、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等周边文化区的因素。它们在传入之后又经历了本土化的吸纳与改造。彩陶纹饰、玉器器型与工艺、透闪石等稀缺资源，乃至丧葬礼仪习俗中的诸多元素，无不透露出约5000年前业已存在的远距离交流与互动。“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”在这里有迹可循——不同区域的精英阶层通过礼器、玉料与仪式知识等的交换，参与到一个超地域的文化共同体中来。区域内的大众交流与区域外的上层互动，两种尺度、不同层次的交流网络交织并存，共同塑造了海岱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文明化进程的复杂图景。

10年间，焦家遗址也成为公众考古的重要阵地。作为首个“山东省公众考古基地”，考古发掘现场成为数万名中小学生的历史课堂。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“礼出东方”、良渚博物院举办的“东方五千年”系列特展相继举行，让5000多年前的文明图景在更多人心中铺展开来。

从初露轮廓的12万多平方米小城，到可感可触的近百万平方米大城，焦家遗址考古逐渐显露出它在中华文明研究版图上的贡献。但对于一处大型中心性遗址而言，10年终究只是一个开端，更精细的发掘、更深入的阐释、更开放的视野……探寻“何以中国”任重道远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大学考古学院）

博古知今

闽江橄榄，福州福果

刘某承



▲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鸿尾仙岭生态农场橄榄丰收。 陈秋霞摄

初尝福州橄榄，往往先觉酸涩。再嚼一会儿，清甜从舌根生出，喝一口水，回甘尤为分明。福州人爱这份滋味，称橄榄为“福果”。福州橄榄种植的历史悠久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，“福州长乐郡……土贡蕉布、海蛤、文扇、茶、橄榄”，可见在唐代，福州橄榄就已成为皇室贡品。今年10月，福州橄榄种植系统成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

橄榄生长在闽江沿岸的沙洲，也生长在邻近的缓坡。临水的土壤疏松，便于根系舒展；山坡向阳、排水较好，又是另一种适宜的立地条件。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，福州人积累了丰富的橄榄种植经验。当地农人顺着江与山的形势安排果园，使橄榄树沿江成带、向山延展。沙洲并非固定不变的田块，水势涨落、河道淤积都会改变适宜栽树的位置。果农要辨认水势与土层，随之调整种植地带。远望是江水、榄林、村庄相连的风景，细看则是一处处根据地势作出的选择。今天果树依然立于江畔，祖辈留下的种植经验，首先是懂得树适合长在哪里。

在洲地种植橄榄，既能防止水土流失，又能利用洲地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源，促进橄榄生长；在一些果园，林下还种植作物、饲养家禽，禽粪还田，使果园的空间得到充分利用，增加了农民收入，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。

种下一株橄榄，不能只看眼前的收成。闽侯县有一株树龄约300年的“惠圆橄榄王”，经历数代人的照料，今天依然结果，年产可达四五百公斤。如此长寿的果树，让人看到一件朴素的事：橄榄园的经营，要以许多年为尺度。树冠如何修剪，枝条何时更新，病虫害怎样防治，都是农人长期观察、反复调整的功课。

在福州橄榄园，高位嫁接是更新树木的一种办法。农人选择健壮的成年树，在枝干上接入优良品种，再细心遮护接穗、管养新梢。切口要平整，接穗与树枝的形成层要对齐；接上之后还须遮阴、及时抹去多余的萌芽。当地有“三分接七分养”的说法，成活的关键常在后续管护。这样既利用了老树已有的根系，又免去砍树重栽。嫁接也不是把所有树都换成同一种果子：惠圆、长营、檀香等乡土品种，有的宜鲜食，有的宜加工，各有用处。保留老树和不同品种，果园才有适应未来变化的余地。

从树上到餐桌，橄榄还要经历另一番“去涩留甘”。鲜果可以细嚼回味；做成咸橄榄、蜜饯，则要靠盐渍、浸提、煮糖、腌制等工序调和滋味。一种传统食品叫拷扁榄，橄榄经捶扁、盐渍、脱盐，再腌制，涩味渐退，风味渐浓。手艺人懂得选什么果、用多少盐糖、等候多久，才能留下橄榄的清香。树上的收获由此成为能够储藏、馈赠的家乡味道。闽侯橄榄蜜饯制作技艺和闽清橄榄露手工制作技艺，已经列入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这份先涩后甘的体验，也进入了中国人的文字与情感。南宋周密在《齐东野语》中记载，橄榄又叫“谏果”：初入口时并不讨喜，回味却清甜，恰似逆耳的忠言。在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，它又有了更亲切的名字——“福果”。节庆期间，人们常以橄榄作为赠礼，寓意“送福”。年节待客的一碟橄榄，远行时带上的一包蜜饯，传递的既是味道，也是对团圆与归乡的牵念。

今天谈福州橄榄种植系统的保护，值得留住的正是这些彼此相连的内容：沙洲与坡地上的果园、仍在结果的老树、各有性情的乡土品种，以及懂得如何种、如何嫁接、如何加工的人。老树需要持续管护，手艺需要有人学习，种橄榄的人也需要从辛劳中得到回报。吸引下一代走进果园，才能让橄榄承载的智慧像它的滋味一样，久久回甘。

（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）

永远的“花溪连”

贺小边

在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象形乡花溪村，有一座刘氏大祠堂（见下图，刘青林摄），青砖黑瓦，马头墙高耸。祠堂门前的匾额下，立着一块石碑——“花溪红六军团十七师师部旧址”。90多年前，就是从这扇门里，走出了一支几乎由一村青壮年组成的连队：花溪连。

1934年初，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，萧克奉命率红六军团十七师北上阻击。但因敌众我寡，部队受挫而返，3月回到湘赣苏区，在永新花溪、象形、黄岗一带休整，师部便驻扎在花溪刘氏大祠堂。那时形势已极其严峻，红军兵力大减，村党支部和苏维埃政府在这时发动“扩红”，全村上下一呼百应。刘智瑞、刘富良、刘克明……120多名青壮年一同报名。4月初的一个清晨，萧克站在祠堂左侧的操场上，宣布“花溪连”成立，编入十七师四十九团，刘建周任连长。后来村里又陆续有人跟上，连队最多时达280余人，其中能查到姓名的有218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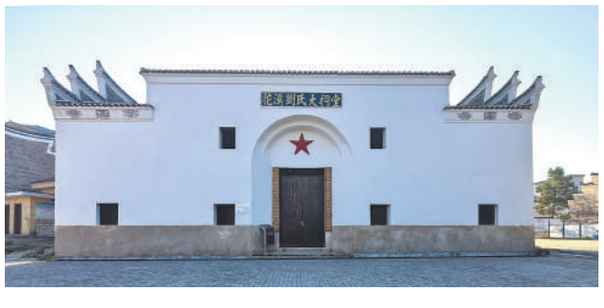
同年8月，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，花溪连随队出发，从此踏上漫漫长征路。他们穿过敌人层层封锁，一路血战，于10月在贵州印江与贺龙率领的部队会合；1935年11月，又随红二、六军团主力从湖南桑植出发，爬雪山、过草地，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可点名时，刘智雄、刘建周等200多名花溪连战士，再没答到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花溪连余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，开赴抗日前线。他们总是冲锋在前，血染疆场。到新中国成立时，当年花溪参军的幸存者只剩10余人。

1949年7月，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解放永新。两个连的解放军追敌来到花溪村，“当年的红军回了村”，日思夜想的贺秋莲大妈，拉上3个儿女站在村口，踮脚望着队伍走来，却没看到丈夫的人影。她哪里知道，早在1934年她的丈夫突围西征途经贵州时，带着全排战友冲锋杀敌，身中数弹仍不肯退下指挥位置，终因流血过多，倒在异乡的山路上。

1954年，萧克将军回到花溪。他走进刘氏大祠堂，站了很久，对陪同的人说：“当年花溪人民踊跃参军参战的场景，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。花溪人民真好！我没有把花溪连的战友都带回来，对不起花溪的父老乡亲！”1991年，萧克将军参加纪念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大会期间，为花溪连题词：“花溪连是花溪人民的骄傲。花溪人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作出过大的贡献。今天，要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，把花溪建设得更好。”这是一位老兵对战友们的致敬。

如今，永新县已将红十七师师部旧址——花溪刘氏大祠堂公布为永新县文物保护单位。这里成了当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研学的重要阵地。“花溪连”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人民没有忘记从这里走出去的英烈们，他们的英名永远镌刻在永新县革命烈士陵园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文物保护中心）



“回首一生何所求，愿把涓涓付巨流”

母彦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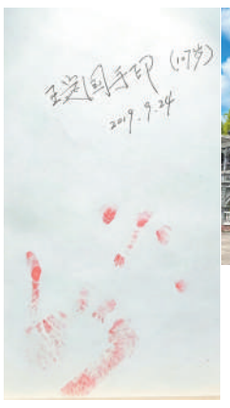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省习水县的土城女红军纪念馆二楼展厅，一行苍劲的题字和一枚鲜红的手印前总有人驻足。2017年，105岁高龄的女红军王定国写下“女红军纪念馆”6个大字；2019年9月，女红军纪念馆建馆10周年，王定国老人亲自按下的一枚红手印，由其子谢亚旭专程送交馆内，永久收藏。这是王定国老人留给后人的精神信物，承载着一位巾帼红军对牺牲战友的深切缅怀，也藏着“九趾走完长征”的动人往事。

1913年，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。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。长征途中，她跟随部队翻越雪山，在搓热取暖的时候把一根冻僵的脚趾碰断了。她强忍着伤痛把伤骨磨平，简单包扎后继续跟着队伍行军……就这样，靠着九根脚趾，她走完了漫漫长征征途。

亲历过长征的生死考验，王定国深深怀念那些牺牲的红军姐妹。于她而言，女红军不是书本上冰冷的名词，而是一个个鲜活真实、并肩战斗过的战友。这份沉甸甸的牵挂，伴随她直至生命暮年。

“女红军纪念馆”，这幅长140厘米、宽85厘米的题字，是百岁老人对逝去战友的深切追思，更是对后辈的殷殷嘱托——永远铭记这些巾帼英雄。晚年的王定国常年卧病在床，抬手、按压都要耗费巨大体力。可为了留下这份纪念，她在病床上反复尝试10余次，才选出最为满意的一枚手印。未曾想到，这也是王定国老人留给我们最后的纪念。时隔不到一年，2020年6月9日，王定国走完风雨跌宕的百余年人生，与世长辞。

从王定国老人题字的那一刻，从接过手印的那一刻，这份跨越世纪的嘱托，就沉甸甸地交到了我们这一代手中。





上图为女红军纪念馆，左图为王定国2019年亲自按下的红手印。 母彦碧供图

作为全国讲述女红军事迹的专题纪念馆，土城女红军纪念馆已收录4113位女红军名字，重点讲述731位女红军故事；连续7年创办“女红军故事讲述会”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研学课程，推出“寻找我心中的红军妈妈”主题活动，编排众多歌颂和怀念女红军的文艺作品……在展陈优化提升的基础上，我们不断丰富展陈内容，将展厅变课堂，打造“纪念馆里的思政课”，以“红色文化+”为牵引，让沉睡的文物真正“活”起来，让历史真正抵达人心。

80岁时，王定国写下诗句——“回首一生何所求，愿把涓涓付巨流”。她用一生践行的长征精神，至今仍激励着我们走好这一代人的长征路。

（作者为土城女红军纪念馆负责人，本报记者黄娴整理）

留在器物上的名字还在“说话”

杨 巍



▶西汉鎏金錾银铜竹节熏炉（局部）。 杨 巍供图

金银器摆在面前，我们看得见的是造型、纹饰、光泽；看不见的，是它从原料到成器之间经过了多少双手。谁做了什么，由谁来负责？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从铭文中找到答案。

从汉代铜器上的官署分铸与工种并列，到唐代银器上的职级序列，再到清代档案中的工时定额，记录分工的方式在变，但把关键工序拆成可署名、可追溯的责任单元这条逻辑线，一直存在。

汉代，金银器制作已从青铜工艺中分化出来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手工业门类。蜀郡、广汉郡是宫廷御用金银器物的关键生产基地。不过，金银器制作虽已独立成类，技术上却仍与青铜铸造共享锤揲、铸造、錾刻等基础工艺，两者是传承分化关系，而非完全断开。

汉代分工的第一种记录形态，刻在官署上。西汉鎏金錾银铜竹节熏炉，炉盖外侧铭文记“四年内官造”，底座外圈铭文记“四年寺工造”。同一件熏炉，两个官署分别署名，编号也不同。这说明汉代宫廷器物的制作，官署之间已存在分铸与协作。

分工的第二种记录形态，则落到工种层面，有另一件器物为证。东汉建武廿三年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，承盘底部阴刻48字铭文，列出四道工序的工匠姓名。一件酒樽上，操作层面的工序拆分与监造层面的责任链被同时刻下。

两种记录形态并存，说明汉代官营手工业的分工，既有官署之间的横向协作，也有作坊内部的纵向拆分。汉代铭文对“工种”的记录并不止于工序名称，还落实到具体的人名，这种写法使分工不再停留在制度描述层面，而成为可核查、可追责的实物记录。

唐代国力强盛、丝路畅通，金银手工业迈入全面鼎盛时期。官营与民间两条线并行，使唐代金银器的制作组织比汉代更为复杂，记录分工的方式也随之变化。

器物铭文上，唐代换了另一种写法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，罗底錾文列出“匠臣邵元、审作官李师存、判官高品吴弘慤、使臣能顺”。与汉代酒樽逐个工种列名不同，唐代铭文不再区分“铜工”“文工”这类具体工序，而是以职级高低排列责任人——动手的人、管工的人、监官、总领，层级分明，责任链条一目了然。这种变化意味着分工的组织形态从“工种并列”转向了官署内部的职级化运作。

同出的智慧轮壶门座盝顶银函，铭文则记录了另一种协作形态：一次由寺院主导、两名工匠协作完成的制作。可见，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参与者，不再局限于官营作坊的匠人体系，分工的记录方式也扩展为更灵活的责任署名。

宋元以后，金银手工业的重心逐步从宫廷转向民间。但分工的记录形态没有出现新的突破，真正把分工推进到前代铭文不具备维度的是清代的宫廷档案。

造办处的活计档、匠作则例是宫廷档案，不是器物铭文，性质与前两代不同。造办处档案记载，成造金塔需錾花、镂铍等多工种协同施工；《清代匠作则例》则按錾花面积核算用工，粗錾与细錾各有定额。从汉唐铭文中的“谁做了什么”，到清代档案中的“配几个人、做几工”，分工的记录方式完成了从责任署名到制度定额的转变。

汉代的炉盖上，一个“内官”，一个“寺工”，隔着炉身相望；酒樽底部，铜工、金银涂工、文工、造工四个名字并排而刻，像一场2000年前的接力。唐代的银茶罗子底下，匠臣、审作官、判官、使臣依次列名，一条责任线从錾刀牵到官署。到了清代，名字淡出，数字登场——几个錾花匠、几个镂铍匠、几寸见方算一工，匠作被写进了定额。记录的方式在变，不变的是那一錾一锤之间不肯含糊的分寸：谁的手艺，谁的名字，谁的责任。那些留在器物上的名字还在“说话”——一门手艺被认真对待过，一群匠人被认真记住过。



◀唐代智慧轮壶门座盝顶银函。 杨 巍供图

本版邮箱 ysbj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 王 瑨